

述往思故录

尹克恂 著

贵阳市中共党史学会编

序

《述往思故录》是克恂同志在1981至1992年间著述的选辑。

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贵州地下组织，曾在贵阳、安顺郎岱、黔西等地活动，对党的工作和共同奋斗的战友有着深厚情谊。1982年调到中共贵阳市委参与党史征研工作，10年来，为征集核实党史资料，跋涉11个省、30个市县，走访老战友、老同志百余人次，与数十位老同志保持长期书信联系，主持编纂了党史资料及丛书300余万字，是一位勤奋而有成就的党史工作者。特别可贵的是：他在1987年离休后，还参与编纂《贵阳“双十一惨案”》、《皖南事变前后贵州的反迫害斗争》、《贵阳少数民族》、《西南各族民众对抗战的贡献》等专辑，并应邀到贵州省委讲师团、省委直属机关党校、金筑大学、省企业党委工作研究会等数十个单位宣讲贵州地下党的历史，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出可喜贡献。

克恂同志选编的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可读性和资料性，能帮助读者了解贵州地下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其中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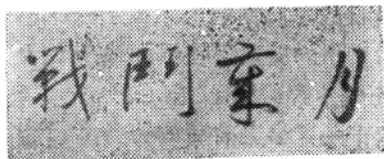
篇章，曾参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社科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如《关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调查报告》，荣获贵阳市首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贵州的抗战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人》，荣获中国共产党史学会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血染的路》，荣获贵阳市“光辉的七十周年”征文特别奖。

我希望这本选辑在述往、思故、存史、育人诸方面，均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秦天真

《述往思故录》

目 次



党是怎么教育我们的？

——回顾三十年代贵阳中学的读书会活动……………（1）

从《民先队报》看郎岱民先……………（15）

附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郎岱县队部》文献资

料选……………（26）

中共黔西城区支部

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的回顾……………（33）

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

“筑光音乐会”斗争纪实……………（42）

风云·风尘·风波

——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战斗岁月……………（64）

《大决战》中的小插曲

——辽沈、平津战役亲历记……………（78）

党史专题

关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调查报告…………… (104)

一曲国际主义的颂歌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华医疗队…………… (120)

皖南事变前后贵州的反迫害斗争综述…………… (130)

腥风血雨 正气永存

——“双十一”惨案前后的特务暴行和革命志士的
反迫害斗争…………… (154)

解放战争后期

贵阳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 (162)

党史沿革

学习党的历史 坚定斗争意志……………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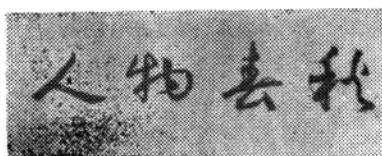
试析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在“七一九”

事件前后的斗争…………… (185)

贵州学联的组建与活动情况及

“二一九”学联事件浅析…………… (203)

贵州的抗战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人.....	(221)
抗战时期贵阳地区的统战工作.....	(235)



白铁肩先生和光懿女子小学.....	(251)
饱餐忧患气愈雄	
——田君亮先生访问记.....	(258)
他把一生交给了党	
——李策烈士传略.....	(267)
一个心绞痛患者的心声	
——从陶信镛同志来信得到的启示.....	(273)
愿将满腔热血 换来幸福人间	
——林青烈士殉难五十五周年祭.....	(280)
心连同志 情系金筑 (编后的话)	(284)

。战斗岁月。

党是怎么教育我们的？

—— 回顾三十年代贵阳中学的读书会

近两年来，在征集党史资料活动中，曾不止一次同原贵阳中学初中部三十一期的部分同学交换看法，大家觉得，三十年代党给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给我们指明航向，帮助我们树立了理想和信仰，使我们学会用革命思想来指导生活实践。几十年来，虽经历形形色色、风风雨雨的考验，大部分同学仍能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为革命事业作出应有贡献，关键仍在于启蒙时期的党的教育。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们粗略统计一下：50人的一个班，先后参加读书会的，约27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十四，参加学联、民先、筑光、沙驼等进步组织的，约20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四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14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八。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数字，它说明：进步事业是以雷霆万钧之势，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它也说明：我们党利用读书会的形式实事求是地对青少年进行的思想教育，具有多么大的威力！

本文拟就三十年代贵州地下党在一个班级里把思想政治工作搞得生动活泼的情况加以回顾。

（一）

我们这一班，是1936年春天考进贵阳中学初中部的第三十一期，全班50个人，集中了当时贵阳市许多小学的高材生，

据说是历届考生中成绩较好的一个班。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17岁（个别外籍学生），处在少年晚期和青年初期，体力和精神的需求都处在极其旺盛的状态，许多同学是功课畏不饱的，酷好阅读课外书籍，已具备一定阅读能力和写作基础，渴求探索真理，喜欢发表独立见解。无疑，这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如何对这段年龄的学生进行教育？如何引导这批青少年走向正确的轨道呢？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时，正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造成东北四省沦亡，华北五省“自治”，亡国的威胁迫在眉睫。但反动派“剿尽杀绝”的反革命目的并未达到，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更加广泛传播，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学生运动的爆发；其共同结果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

“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抗日救亡巨流，虽然在贵阳没有引起急风骤雨般的反映，消息传来，却激励着许许多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下，愤慨的心潮哪能平静？忧虑的思绪何以安宁？我们怎么读得进训育主任指定的《曾文正公家书》呢？是的，时代洪流无法阻挡，进步文化不胫而走，进步教师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以讲授人生哲学受到同学们崇敬的田君亮先生，随时启发大家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教语文和史地的王启澍先生，给我们讲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在我们眼前展现一幅美丽而富饶却又蒙受尘垢的祖国画卷；……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一批可塑性极大

的青少年来说，除了教师的影响外，家庭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白色恐怖下，进步影响往往是以极其巧妙的形式，在熟知的人们中间悄悄而有力地传播着。我有个堂姐，叫尹素坚，用组织上的结论说，她“是一个优秀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从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贵阳地区开展地下活动起，许多地下党的负责同志都同她有过联系，她的家就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还在我13岁的时候，她就把毛哥（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烈士）的遗诗给我读，当我反复背诵“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等诗句时，联系烈士壮烈牺牲的场面，我被这位年青的先驱者深深感动了。坚姐还教我抄写《国际歌》、《工人歌》，要我跟着她们低声学唱。1936年，我搬到她家住，和她，和她的战友们，有着更多的接触，从而开始了决定我的政治属性的新的一页。同班同学丁培聪，是我的表哥，丁毅同志的弟弟，丁毅同志是在1935年“七一九”事件到处抓共产党的艰难时刻，由于坚姐的启发和直接联系而踏上革命征程的，不久即参与省工委机关工作，丁培聪也被吸收从事印刷传单、文件等活动。还有些同学，从另外的渠道也接受了一些革命的影响。

但是，毕竟我们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坚姐也好，惠姐（即丁毅）也好，都认为我们年幼，不敢要求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自己倒觉得已经懂事了，总想找机会表现自己，于是，自发的带有顽皮性质的做了一些我们认为是该做的事。我们进中学的第一位语文老师叫杨××，他有政治偏见，给我们的印象不好，因此我们故意在课堂上问他：“老师，巴金这个笔名是怎么起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巴金是四川巴县人，他骄傲得很，把自己说成是巴县的金字招

牌。”惹得我们哄堂大笑，公开告诉他：“不懂就不要装懂嘛！免得误人子弟。”气走了杨××，他再也不到贵阳中学教书了。我们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一”队，因为一是万事之始，有一就有一切。我们的球艺固然不好，却敢于向老大哥挑战，输了也不会脸红。有一次，我们在大兴寺打篮球，“青年阵地社”的李××跑来活动，还把他们的宣传读物给我们看，丁培聪把这事告诉丁毅，丁毅和尹素坚都很重视，丁毅向李策同志汇报了，李策同志决定叫陶信镛同志来给我们组织读书会。陶信镛把我们俩和同班同学邱均治找到一块分析形势。他说：我们爱科学，腐朽的社会制度处处阻挠科学的发展；我们爱民主，反动当局偏偏疯狂推行特务统治，不让我们有做人的权利。因此，要做学问，首先要解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做混世魔王吗？做出家和尚吗？做害群之马吗？做普洛米修斯式的人物（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人），为人类盗来火种和光明吗？这就是人生观问题，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正确认识国家和社会，正确认识历史，预见未来。一席话把我们说动了心，我们提出许多问题，他说：“组织个读书会吧！一块学哲学，学政治经济学，学文学。”从此我们接受了党的领导，在党的教育下组成三十一期的第一个读书小组。

（二）

组织起来以后，平时分散阅读，或共读一本书，或选读不同的书，每周一次在陶信镛或邱均治家集会。集会有三项内容，一是时事报告和形势分析；二是读书报告和讨论，三是研究发展读书会的工作。

读什么书呢？陶信镛同志告诉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革命文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要学习时事，解决当前奋斗目标；要学会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解决为当前政治任务而进行斗争的策略与方法。

我们是从读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入门的，我们没有想到，高深的哲学竟然可以拿来解释“雷锋塔倒塌”等最一般的生活现象，这本书给我们打开了思想禁区，打掉了神秘感，使我们萌发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和要求。接着学习了胡绳著《新哲学人生观》，它帮助我们懂得人生的意义，人活着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使我们在探索人生奥秘这一方向性问题时，得到鲜明的答案。艾思奇和胡绳在书的末尾，都遵循马克思的名言，着重指出：从来的哲学家，都只是各色各样地解释世界，而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么一来，我们学习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学习的兴趣越发高涨。

时代特点要求我们十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在民族危机严重，国民党腐朽反动，青年人迫切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在《生活》、《世界知识》等刊物上了解形势、分析问题外，多么希望系统地学到一些科学的理论知识啊！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如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平心著《社会科学研究法》等，对我们都起过启蒙性的教育作用。

在学习政治理论书籍同时，我们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文艺书籍，并把文艺和理论联系起来；比如钱俊瑞的《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开头就介绍了矛盾的著作《子夜》，要求我们通过文艺的感性描写来理解经济问题的现象与本质，又用

经济理论来分析《子夜》的主题思想与人物塑造。在学习《新哲学人生观》时，我们还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富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超越时间和地域的界限，深刻地教育着人们。我们把书中的英雄人物伯惠尔、夏伯阳、郭如鹤等，一个一个地进行分析，把那些脍炙人口的战斗誓言记录下来，热情传诵，互相勉励。

随着学习要求的不断提高，我们学习了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这是当时一本系统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托派的冒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与揭露。我们还学习了列昂捷耶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一些经典著作。

怎么读呢？一开始就强调由浅入深，量力而读，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兴趣选读，参照别人的推荐和介绍选读。

读书会注意训练大家读书和写笔记的基本功。读文艺书要求找出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品德及其在书中的变化与发展，用红蓝笔加注各种符号，最后探索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时代背景。读理论书要求学会在书上签划批注，对必须记住的概念、范畴、术语、解释或定义，都用红笔加线；对概念体系，则按自己的设计确定一套符号，如学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为最高层次，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次一层次，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为再次一层次等；警句、名言加波纹线；新接触的或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概念加圈等。这些符号如何用，根据自己的习惯自定，不强求一律。写读书笔记从简到繁，从易到难，先

学会摘要，然后简明概述大意，学会从不同的书籍上找出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进一步写心得、体会、述评。

读书会重视读报和分析时事。“九一八”事件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矛盾都在深刻发展，帝国主义同苏联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英美法同德意日之间，更是纵横捭阖，错综复杂；中国人民要求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紧密相联，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求更多地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了解各国人民的斗争情况，正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情，鼓舞我们持续前进。为了学会读报，我们选读了金仲华编的《国际新闻读法》、胡仲持编的《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注意办报者的后台和消息来源，还学会读报时使用地图，用各色小旗在地图上标明战况进展。

学习时事采用两种方法，一般是读书会成员轮流准备时事报告，共同补充讨论；有时由领导人报告和分析（包括传达地下党组织掌握的消息和材料），大家提问和探讨。提问讨论的办法很好，不仅作报告者平时要十分认真地看报、评报，以便形成综合概念，而且在提问讨论中检验自己的认识深度。我们的读书会从3个人发展到8个人以后，王发善同学就因为分析形势时深入浅出，有独立见解，被大家誉称为“牧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抗战开始前，白色恐怖始终笼罩着贵阳，抗日救亡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读书会是在党的外围进行活动的一种有效的

组织形式。抗战开始后，地下党领导着一些群众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党的活动重点虽然转移，但配合着公开的活动，秘密的读书会仍然存在。党组织通过读书会培养和吸收党员。

发展读书会员是既审慎又灵活的。首先要寻找发展对象，除了政治表现以外，很强调发展那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功课好的、有活动能力的同学。确定对象后，同对象建立互相关心和信任的关系，并在建立感情的全过程，对他进行思想影响，引导他从关心个人前途到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当发展对象有学习革命理论的要求时，才吸收他参加读书会。当时，提高警觉性是特别必要的，形势逼着读书会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仔细把情况摸清楚，所以，读书会的发展往往是在同班同学和最熟悉的亲友中进行。

读书会的发展是迅速的，我们这个班，1936年下半年才3个人，1937年初就发展了王发善、杨斌毅等5人，这8人被训育主任不怀好意地称为“八杰”。后来，你发展一个组，我发展一个组，组里成员又发展新的组，从三十一期发展到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期，从高十六期发展到高十七期、高十八期，正象撒播的种子，落地生根，枝叶繁茂，郁郁葱葱，蔚为壮观。

(三)

对往事的回顾生动地说明：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同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党化教育，正是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搏斗。

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党化教育，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蒋介石法西斯独裁政权服务，故要求学生不问国是，闭门读书；反映在教学上，提倡尊孔读经，实行高压统治，用分数、留级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多采用

陈旧的注入式，不注意启发学生思考，不让学生参加教学活动。历史证明，他们的整套教育办法都同其目的是一样反动落后的，因而随同其整个文化“围剿”一道，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们党领导的读书会，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深重的民族危机，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乎人民心意，在全国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党培养我们共产主义世界观，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用这种观点来承担起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为此，在教育办法上注意启发自觉，在活动中学习，并注意理论结合实际。

一、启发自觉。如前所述，从发展读书会开始，就深入调查发展对象的思想、感情、需要、兴趣、学习能力等。根据调查，启发读书会成员从读自己喜好的书开始，逐步扩大需要和兴趣，逐步引导他们扩大和加深阅读，不断提高觉悟，这是立足于把教育看成一种手段，是外因，通过受教育者的需要、兴趣等内部刺激发挥作用，远不同于只强调教育者的意志，并单纯利用一切外部手段（传授教材的技艺，严格的课堂纪律，从外部引诱学生的手段——分数、表扬，威胁学生的办法——体罚、留级等）来制服学生的作法。

二、在活动中学习。读书会主要不是通过听讲，不是死记硬背，而是通过各人作报告，写读书笔记，分析讨论等等活动，在活动中学习，因此，学得活。这种学习能不断产生自觉学习的动力，使所学的知识理解得深，掌握得牢，而且易于形成观点和信念。换句话说，就是易于把书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三、理论结合实际。有几方面的结合：一是同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学习内容要求能解决当时形势所提出的各种紧迫问题；二是同生活结合，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如恋爱问题、升学问题、吃饭穿衣问题、家庭问题等，都要求我们用书学到的本知识辩证地进行妥善处理；三是同工作结合，能解决在学校里出墙报以及发展读书会等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四是同未来的需要结合，比如学哲学，当时确有许多搞不懂的地方，无法结合实际，日后在生活、工作、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学着用哲学观点来分析这些问题时，也就加深了对哲学的理解，对形成世界观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和读书会的教育与学校课程的结合问题。教师和学生是组成教学活动的统一体，有自觉学习的要求，又能尊重教师的辛勤劳动，就为师生间建立正确关系打下了思想基础。我们这个认识，是在否定了过去的一些顽皮做法后逐步形成的。气走杨××，新来的语文老师叫高滔，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长篇小说《新生代》的作者齐同，他在这本书上，热情赞颂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告诉我们学好祖国语言文学的重要性，语言规范化的意义，什么叫现实主义文艺，如何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等。每次上课，认真地听讲，飞速地记录，热情地提问，亲切地探讨，构成一幅动人的课堂即景。在吴瞿、肖家驹、何锡周等老师的课堂上，气氛也是这样活泼。与此同时，关于读书会的教育如何与学校课程结合的问题，陶信镛、严金铨同志都一再强调要把读书会的学习精神用到学校功课上，学习许多有用的知识，并指出：功课不好，对周围同学的影响就会降低，失去号召力。所以读书会的成员首先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我们这一班很多同学本质上的优点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对共产主义的壮丽前景充满信心！或者说：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陶信镛同志在1937年10月去延安后，严金铨同志代替他来领导读书会，他是我们的楷模。这个年仅十六、七岁的青年人，身体壮实，性格开朗，两道浓眉显得无比刚毅，一双巨手展示精力充沛，如此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党要他躲在暗室里刻写钢板，他就凭着一根竹筷、几支唱针，孜孜不倦的刻；没有油印机，在玻璃上括油墨，竟能一次印出5百多份文件、传单。那蝇头仿宋体，真象铅印的一样，连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惕庐看了学联的《告同学书》，都断言是外地送来的宣传品。谁又知道他在这个工作上支付多少精力呢？他把崇高的理想和平凡的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把工作做得精益求精。他在床面前撒下一推煤灰，稍有空闲，就跪在地上用棍子或指头练习仿宋字。他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我最理想的工作，就是革命胜利后爬上城头写七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万岁！”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革命胜利，1938年2月21日，他和地下党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同志一道被捕，狱中坚持三年斗争，于1941年元月19日被敌人戮死在伪保安司令部，牺牲时年仅20岁。

同班同学中，有一位令人崇敬的革命志士，叫王发善，他性格沉静，善于思考，不多言，言而条理分明；这样一位内向的青年，当他认识和掌握真理后，便迸发出火一般的热情，奔赴边远的桐梓和望谟县去进行党的工作，后来在望谟被捕，1941年英勇牺牲于狱中。

另一位同学，叫邱均治，是个大盐商的小少爷，剥削阶